

懷念張灝老師：一些日常學習及生活面的回憶

A Reminiscence of Day Studying with Professor Chang Hao, and Others

陳俊啟 (Chen Chun-chi) *

繼 2021 年 8 月 1 日史學大師余英時的離世，2022 年 4 月 20 日思想史家張灝先生也離我們而去。張老師的離世對我而言是件很難過的事，因為我個人受到張老師的啟發和影響是很大很深的，藉此機會談談我和張老師的師生緣分，以及一些個人與張老師有關的親身經歷的回憶。至於張老師在思想史上的卓越學術成就，他的著作具在，有許多張老師的及門弟子以及學界先進討論，在此不談。

首先我得說明，我不是張老師的門生，不是歷史系出身，更非思想史的專業，但是和張老師卻有多年的接觸、聆課、請益的機緣，以下的憶往，是出於一隻腳踏入張先生思想史世界的局外人視野。我和張老師的緣分始於 1987 年到哥倫布市 (Columbus) 的俄亥俄州立大學 (OSU) 讀書。我原來是念外文系的，後來到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校區 (SUNY-Binghamton) 念英美文學，拿到碩士後，因為個人及家庭因素，決定轉念東亞系，於是來到了中西部這間大學。東亞系中有勞延煊、陳穎 (穎士)、薛鳳生等幾位國學底子豐厚且外語能力強的學者，其中業師勞先生乃勞榦先生哲嗣，臺大歷史系畢業後，至哈佛大學和柯立夫 (Francis W. Cleaves) 教授研讀元代思想史，和余英時、張灝幾位先生從哈佛時代就彼此相熟識。勞、陳、薛幾位先生和余英時先生常有詩歌唱和 (可參看鄭培凱編，《余英時詩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22〕以及《蠹餘集：汴梁陳穎

士先生遺詩稿》〔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12〕余英時先生的序)，張灝先生和這幾位先生很親近，尤其在學術上常疑義相與析。不過據我所知張老師似乎不從事古典詩歌的寫作，沒看過他和幾位先生唱和或留下任何古典詩的作品。我原來在臺大外文系時就對思想史產生興趣，讀了一些彼時校園廣為學子閱讀，諸如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英文本，以及許倬雲等著作，還差點準備考歷史研究所。但是那時候其實還不知道張灝老師或讀過其著作。進入東亞系，和勞先生讀中國古籍經典及思想史，和黃宗泰先生 (Timothy Wong) 研讀古典小說，逐漸將研究範圍集中在晚清小說，尤其是梁啟超的小說觀如何影響到整個中國小說的發展。勞先生建議我到歷史系去修張灝老師研究所的課。這是我第一次與張老師接觸，後來看成績單，我竟然在 OSU 修課期間 (1987-1993) 上了 5 門張灝老師的課，比上東亞系任何老師的課還多！

第一次上張老師的課，雖然上課前試著讀了一點張老師的書，還是有點忐忑，但是張老師卻蠻親和、謙和的，沒有想像中大學者的威嚴，一點架子都沒有。方面大耳，臉上架著黑框眼鏡，露出坦蕩智慧的眼神；身材有些像橄欖球員 (初次的印象)，帶著一個 folder (檔案夾)，裡面只有課程綱要和一頁列了幾行他上課的重點大綱，沒有帶書 (不像有些英文系老師上課時會拖著小型行李箱，裝滿了上課可能會提到或向學生展示的書)。

* 作者現為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選張老師課的大都是來自東亞系的研究生，因為中國思想史在歷史系算是小的領域，美國學生一般中文能力不夠，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理解也很貧乏；至於丘為君學長早我幾年從柏克萊來 OSU 入張老師門戶，課早修完了，幾乎不和我們一起上課。張老師似乎還算喜歡和東亞系的同學上課，大概因為我們大部分都不是歷史專業（較多是中文以及外文專業），所以一些思維觀念及訓練可能比較不同，而張老師的學問方面很廣，對很多不同學科的思想一向很有興趣，也很能接納不同學術立場的學生意見。

張老師上課不像現在很多老師一樣準備 PPT，然後有條不紊，一一按照老師的思路及脈絡，將所欲傳達給學生的知識講授予學生，而是依著他的思路釐列簡要大綱，稍加解釋各個條目的議題中重要的核心理念及脈絡後，接著引領學生依此脈絡發抒意見（當然事先有些材料須閱讀），有時候乍看似乎沒有甚麼條理或脈絡，但是在同學發表意見後，張老師有一種神奇的能力（其實是深厚的功力），能將各個同學從不同立場角度看似不同的意見整合到他所欲傳達核心議題的框架中。這樣的整合往往是跨領域的，奠基在其對於中國傳統學問及西方的歷史、思想、政治、社會學，甚至文學等廣泛知識的涉獵，同時也是他一向對於學說論點的深思熟慮及造詣所在。所以上張老師的課，我覺得像是在看魔術師變魔術一樣，或是在拼圖遊戲（jigsaw puzzle），看著種種瑣碎、看似不甚相關的材料，在張老師手裡卻呈現出條理分明，甚且前後勾稽，形成一個有學術意義的圖案（結論）。他應該也受到其老師史華慈教授（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的深刻影響，通常不會輕易對一個事件、人物或現象做疏略的結論，而要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but...yet...even so...still...however...，一一地從不同角度、不同面向、脈絡、不同層次、不同立場來對之作省查思考。上課的內容／材料（what）當然重要，但是我個人更覺得興趣盎然的是觀察感受這過程（how）。張老師不只在思考辯證過程有其獨特的表現，在西方的學問也極其豐沛。我的感覺，他不僅仔細讀過，也能精要地將這些學者著作中的重要論點概括。我印象中，很多社會學、神學、政治學、文化人類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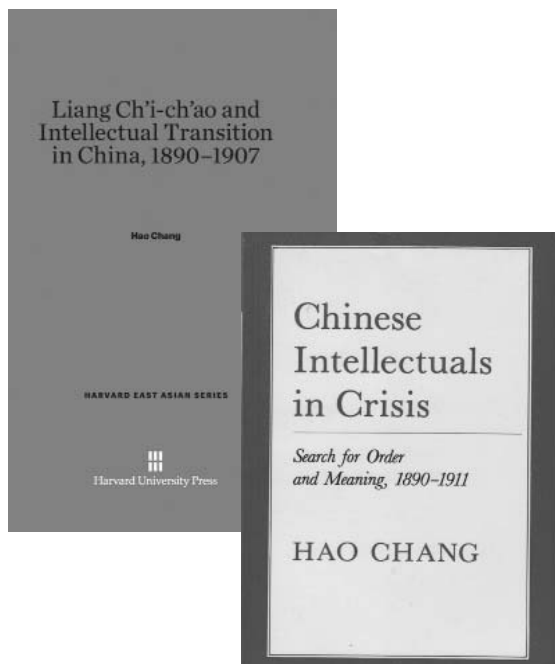
知識是從張老師課堂上（以及著作中）獲得的。簡單舉例：Max Weber, Talcott Parsons, Karl Jaspers, Robert Bellah, Clifford Geertz, Eric Voegelin, Reinhold Niebuhr, Paul Tillich, Charles Taylor, S. N. Eisenstadt 等等，更不用提中國思想史領域的 Benjamin Schwartz, Joseph Levenson, Thomas Metzger, Maurice Meisner 等重要思想史家及他們的著作。

用現在年輕人流行的說法，張老師的「口條」並不出色，無法與余英時先生，尤其是杜維明先生的辯才無礙，口若懸河的侃侃而談相比。他上課講話是緩慢的，初聽似乎有些木訥，拙於言辭，但我們很快就明白，其實張老師是思辨型的老師，他一面聽著學生的看法，一面在思考，消化整合這些材料，一方面也在思索如何以最合理最有力的方式將其思考的結果謹慎地表達出來。這說來容易，其實是很難的，尤其考慮到我們這些學生大多不是歷史專業（外文出身的居多），我們所提出的，常常是非歷史專業領域，而比較偏向文學，尤其是受西洋文學及理論影響的論點。這在某個程度上，當然對授課老師是一種挑戰，但是我覺得張老師很喜歡，而且樂在其中。我想這不僅是挑戰，同時更是和他對於學問的渴望及追求有關。

這種對於知識的執著和追求，可以由幾個地方看出。王汎森先生在他悼念張老師的文章〈流水四十年間——紀念張灝院士〉中提到，張老師家學淵源，因而對於古文有很深的浸淫。沒錯，張老師的短論文往往提綱挈要，要言不繁地將所欲傳達的核心意旨在不長的篇幅中充分呈述，長文則架構井然，深思熟慮，將相關議題做多面向的思索後，獲致一個人所未見，充滿洞見，令人悅服的結論。這應該和他從小廣讀古文及策論有關。前面提到張老師和東亞系的勞、陳、薛幾位先生常有往來（生活以及學術上）。這幾位先生的國學根底都極深，每當張老師在閱讀中國古籍，尤其是詩詞方面，有不甚確定的地方，他往往會向這幾位先生請教。我不知道，也不確定張老師在詩詞方面的造詣，只是從來沒看過他做的詩詞（我手頭留有數件勞先生給我留念的幾位先生唱和的詩稿，其中沒有張先生的詩作）；但他在詩詞方面若有沒把握的地方，確然會和幾位東亞系的師長請教切磋，務求對於典故、意義及相關的脈絡充分掌握

（比方說譚嗣同的詩詞），這是我從勞先生那兒得知的。

東亞系的博士生須具備兩種外國語的能力，我原本學過法文，因而需補修日文。一次張老師看到我的日文讀本，翻閱後他隨即囑咐我幫他購置一套，並告訴我他研究生階段沒有把日文讀好，有機會想把日文讀一讀。張老師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1971) 出版同年，黃宗智 (Philip C. C. Huang) 先生也出版了有關梁啟超的著作 *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其中對於梁氏於 1898 年搭乘大丸輪抵達日本橫濱後的種種行跡，以及在此環境中思想發展的研究，大量採用了日本公安單位鉅細靡遺的檔案資料（連梁氏與孫中山等人在酒館會談都有記載），獲得了成果。張老師是研究梁啟超的專家，他雖然並沒有直接述明想學日文這事與以往無法使用日文資料的直接關係，但是他有幾次聊天時（下課後我們幾位同學習慣和老師聊一下，陪伴著他走向研究室），對自己當年無法使用日文資料，致使研究上有某種缺憾，還是偶爾會提及。（在將近二十年後，似乎仍耿耿於懷？）添購日文教材大概是一種心理補償，但也可看出張老師對於學術的專注及投入，希望在能力範圍內做到較完整的態度。



王汎森先生在幾處地方都提到，每次張先生碰到他的場合，常會問最近讀什麼書？我也有同樣經驗。我想這不是客套寒暄，而是張先生總是很真誠地希望了解學生輩在讀些什麼書，追求怎樣的新知，另一方面也是他對於學問的好奇及追求，藉由學生輩的閱讀來了解最新的學術發展。他不會只問讀什麼書，總是進一步要我說明這書是什麼性質？讀了以後有什麼想法？等等。我是念文學的，對於西方文學、文化理論接觸較多，張老師也仍顯出興趣，想多知道些。他也會問我對臺灣政局的看法，應該是想從家仍在臺灣的學生處知道年輕人，以及一般臺灣百姓的想法。我相信他對中國大陸的同學應該也是如此，不過也許因為和臺灣的淵源，他對臺灣的訊息了解比較多，關心也似乎較多些。同時，張老師對於傑出的晚輩，也不吝於稱揚。不止一次，聊及思想史的一些學者，他就帶著一點愛護疼惜並肯定晚輩的口吻說：「王汎森這小子不錯！」「XXX 很用功！」「XXX 這論文寫得不錯！」他有時候也會提示有哪些作者或作品值得細讀深思，如王汎森提到早年張老師提示他閱讀韋伯的《宗教社會學》，為君學長也提到類似的經驗。除了韋伯外，我記得我閱讀 Clifford Geertz 的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是張老師告訴我去讀的，此後我就被 Geertz 吸引了，將他的書幾乎都找來讀。至於 Robert Bellah 則是他上課及課後提了幾次的作者，尤其是他的 *Tokugawa Religion: 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我後來也跟著瀏覽了 *Beyond Belief: Essays on Religion in a Post-Traditional World* 以及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等書。我的很多思想史及社會科學知識都是這樣順藤摸瓜、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而源頭很多都是來自張瀨老師。

張老師思考很縝密，表達時也很謹慎，不輕易對人事物下定論，因而寫論文或寫書都極嚴謹。王汎森說張老師與他的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糾纏了好幾年，總不放心，這與我的理解是一致的。此書出版前後我正在上張老師晚清思想的課，買到書開始閱讀，心中覺得很有親切感，當然也很佩服。更值得一提的是張老師英文極好，寫得很漂亮，幾位師長輩的老師（包括英文為母語的美籍老

師)都很讚賞。我記得曾經聽他們說,張老師的英文不僅是漂亮無瑕疵的英文,甚且已能寫出有他個人文體風格(style)的英文了。這對於非以英文為母語的學者來說,是很高的讚譽。他指導學生極嚴格也很關心。丘為君學長是張老師的嫡傳弟子,在寫博論時,除了學術上指導老師的偉峰高矗有很大的壓力外,在英文寫作表達方面應該也是壓力極大——當然也應該獲益多多才是。我不是張老師指導的學生,在這方面沒承受到來自張老師的壓力(不過也沒逃脫來自不同老師的壓力)。

我在博士論文口考的時候,一位年輕的教授問了一個我沒準備也不在自己專業研究領域的問題,一剎那之間腦筋一片空白,無法回答。當場勞先生和張老師很委婉地提示我試著從某些角度來切入,不過因為太緊張,口乾舌燥,直冒冷汗,回答不出來,終究沒能通過,後來重新安排了一次口考方才順利完成。後來我才知道張老師當年在哈佛博士論文口考的時候也有類似的情形發生,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問了有關《史記》的法文譯本,張老師一時也未能答出是沙畹(Édouard Chavannes)的翻譯。有了這次挫折的經驗,我對學術的思維及操作有了更多的理解。後來我常借我自己以及張老師的例子

對學生說,其實口試面談時,老師會問超出範圍的問題,重點並不在於考倒學生,而是要學生知道學問之道無窮,要嚴肅且謙虛地面對,另一方面則是要觀察學生的學術視野夠不夠寬闊,以及當學生面對一個不熟悉的狀況,如何鎮定地展現其實力,如何應對。在其中老師可以看出學生掌握的知識範疇、思考邏輯以及語言文字的組織及表達能力,當然還包括臨場面對壓力的能力。

我在1996年回到臺灣教書,張老師回臺灣開會,特別交代早我幾年先回臺灣的為君學長,要好好照顧我,多年來為君學長也果然在不同場合不同階段對我有諸多照顧。後來張老師從OSU退休到香港科技大學任教,2005年再度從香港科大退休,科大人文社會科學院為他辦了一個「張灝教授榮退學術座談會」,邀請了港、臺、中國大陸一些校外學者與會,這裡面包括了李歐梵、金觀濤、劉青峰、高承恕、王汎森、古鴻廷、丘為君、梁元生、陳方正、許紀霖、張隆溪,我也忝列其中,大概只有張隆溪和我不是思想史領域的學者。據說是張老師交代把我列在邀請名單上,和臺灣的學者一起過去的。其實我有點受寵若驚,但還是要感謝張老師給我這機會參與張老師退休座談會,認識並與這些重要的思想



2005「張灝教授榮退學術座談會」後留影,左起鄭樹森、丘為君、陳俊啟、高承恕、金觀濤、張灝老師、王汎森、劉青峰、陳方正、林載爵

史學者（以及幾位後來張老師在香港科大收的研究生，翁賀凱、范廣欣、許國惠等）交流，更徜徉在山明水秀，風景秀麗的科大校園，度過數天美好的香江假期。

有一次，在閒聊時，不記得談些什麼，老師提到我並不是歷史學中人。乍聽似乎有很強的學科門戶意味，將我排除在外。但是有許多場合張老師卻也常常記得我，照顧我。我有時會想，張老師很清楚學科之間的畛域，有些基本思維及訓練確實是很不一樣的（其實我自己也很明白，外文、中文、歷史、哲學等不同專業都各有其特殊的學科思維及操作方式），但是他也從來不會將來自不同領域者排除在外，充分尊重諸如在香港與他同事或熟識的鄭樹森、張隆溪先生等重要文學學者的看法。他在研究晚清思想時充分利用文人的詩詞（如譚嗣同），這可視為陳寅恪所說的「以詩證史」；在研究五四時期的思想發展時，也常常從文學來理解思想及時代，比方說李大釗及郭沫若的詩。印象中他指導過一本有關郭沫若的博士論文：Chen Xiaoming, "Towards a Confucian/Marxist Solution: Guo Moruo'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o 1926" (1995)，其中有部分討論郭沫若文學作品與思想的關係；他也指導過一篇梁任公文章修辭手法析論的碩論。這是他的學問廣博，跨領域思維的表現及心胸，有其本分的堅守，但也不為本位所囿限。我大概正是因為不是思想史專業的學生，反而讓張老師認為有某些來自不同領域可資參考的地方。我從來沒就此問題問過張老師，也沒機會了。但能受到張老師的影響及照顧，對我而言已經是學術生涯及人生的恩惠了。

我個人在上過張老師以及勞延煊先生的思想史（以及更早大學時代李定一先生的中國近代史），理解到從晚清到當代的社會發展，種種歷史變遷，以及在經過西方衝擊後所呈現有別於傳統的道德文化發展，同時也受到了五四時代的「激進反傳統主義」（林毓生的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的影響，對於傳統儒家思想所標舉的一整套自上而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政治、社會、文化思想及實踐，在解紐（「禮崩樂壞」）後的現代社會是否能持續有其合法性及適切性（validity），我是悲觀的。在課堂上，我若有若無有此情緒表現，對於杜維明教授的第三期儒學復興也不以為然，沒有信心。但是張老師

上課時是蠻寬容的，不以為意。他和他們那一輩的師長，由於受到深厚的傳統國學訓練，縱然對於從晚清民初一路到中國大陸的文化革命的歷史發展及其對傳統文化的摧殘，有某種低落的情緒和感慨，但是在另一層面上他們對於中國文化卻仍保有一種敬意。勞延煊先生對於中國大陸共產主義治下的道德、文化淪喪、政治腐敗等有很多的不以為然及批評，相對地對於臺灣能保存下來不少傳統文化則有較多的肯定（政治上則不以為然）。張老師對於中國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中國文化，也有一種經過深思熟慮後的認同及信念。經由現代中西學術觀點回頭對中國傳統重新評估，有了不同於過去的理解和看法，張老師他們似乎既能做出批評，又能有所堅持，認為傳統和歷史不只意味著過去，也不是沒有再生的活力，儒家思想中的精華在經過汰淘後，意味著新的觀念和形態的可能展現。我想，這是張老師他們這輩師長對於中國傳統、對於文化的理念及信守。

我一向很少和師長輩噓寒問暖、頻繁接觸請安，一方面是個人的疏懶習性，另一方面則是認為這些老師都是學者或是重要作家（像外文系的王文興老師），讀書研究創作的時間都可能嫌不足，最好別在其個人生活上再去給他們添加無謂的繁瑣干擾，所以有關張老師家裡的事我多是聽聞為多，從沒去拜訪請安。張老師從香港科大退休後回美住在華盛頓特區，我也從沒去請謁（其實我多年沒到美國）或去函問候，往往都是張老師回臺開院士會議時，打個電話問好。後來間接由為君學長及王汎森兄之處點滴得到老師的近況，聽說張師母身體有恙，張老師得照顧師母的起居，聽了心中有些惻然。張老師許多年來都是師母在細心照顧他，甚至在學術上師母也盡了一番心力，蓋老師的論文一向都是手寫，所以早年是師母抄寫，後來則是請學生幫忙打字成稿，但主要還是師母總成其事者。（可參看丘為君，〈追憶張灝先生早期的思想學術發展與生活點滴〉，《華人文化研究》10卷1期〔2022.6〕）師母身心的衰頹以及後來的離世，對老師應該是人生一打打擊。我也不知如何盡我做為非門生的心力，只能心中希望一切都安好。

我在2019年終於（實在疏懶成性！）將多年來晚清文學及思想研究的論文集結成書《依違於傳統現代、中

西——晚清小說新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9)，其中的各篇論文雖然不必然直接徵引張老師的概念或觀點，但是熟悉晚清思想的人，應該都可以理解到在若有若無之間，我的思維及論述有很深的張老師影響及烙印在。在〈自序〉中，我將多年來獲益於勞（延煊）先生和張灝老師，銘感於心的心情第一次在多年後表述出來。對張老師，我感謝

引領我進入近代思想史（尤其是梁啟超的思想世界）的張灝教授，他在學術上的嚴謹態度、廣博的知識，以及將各式各樣知識融會一貫的胸襟及功力，是我佩服追摹的楷模。

書印好後，由為君學長處取得張老師在華盛頓特區的詳細住址，即刻將書付郵寄至 Reston, VA，並附了一張便條，直接表述我對張老師出自於內心的感謝，也以這本書做為對老師多年來照顧提攜的回報。此後一直沒有任何回覆，我也沒特別在意，只是有點出人意料——以我對張老師的了解，他一向是不大寫信的，但是以他們這輩師長的習性，在禮數上通常會簡要回覆才是。後來王汎森兄居間，張老師將手頭五千多冊中西書籍捐贈給國家圖書館。看到報導中的張老師身影及神情，心裡有些黯然，因為張老師的氣色並非太好，和他以往的紅潤及充沛元氣相較，似乎有些萎頓。（除了有一陣張老師做心導管手術，飲食上受到了極大的限制，這對愛好美食的他大概是不易調適的新生活習慣，否則大部分時候都是心思細密，神氣爽朗。）這時候也才知道，其實張師母後來過世，老師就由 Virginia 遷往加州，由女公子來安排其生活。不久，媒體即報導張老師離世的消息。聽到消息，心中無然多時，贈書國圖時我已有些不太好的感覺，但也沒想到令人難過的消息很快就傳來。有好多天，心中總縈繞著過往與張老師相處的一些點滴記憶。

看來我寄到 Virginia 舊宅的書老師應該沒收到，我帶著一點浮動難過的心情及哽咽的口氣，告訴內子：我回報給張老師的書，他沒看到，也不可能看到，我的一番感激的心意看來是無從傳達了。難過的是張老師永遠也收不到我出自肺腑，對他難以名狀的感謝之情了。

在我學術旅程上，除了臺大外文系幾位奠下我西洋文學及理論基礎的老師外，有兩位恩師對我影響深遠，一位是勞延煊先生，另一位則是張灝老師了。勞先生對我亦師亦父，除了中國古典學問外，在我做人處世、道德出處的信念上影響深遠，他老人家過世，我沒有辦法寫出任何文字悼念，蓋情感深厚，情同父子，文字實在無法表達心中所欲表達的悲慟感情，只能放在心底。張老師在學術追求上對我的啟發及影響是極深遠的，和我後來所從事的晚清民初學術思想與文學研究的關係也最密切。葉主編要我談談和張老師上課的情形，原來也覺得沒法寫出，經過了幾個月的沈澱，還是將一些和張老師上課的相處及學習的情況，以及他對我的愛護提攜略加敘述，至少可以從一個非思想史專業的學生從學經驗中，提供一些生活的側面，讓大家了解一代重要思想家一些非學術的點滴。

張灝老師雖然離我們遠去，他的重要學術著作具在，且對學界發生重大影響。現在他老人家已不在了，但他的一切仍然會長存於吾人心中，就像其他人與事一樣，並不需要在眼前方能有愛意，有敬意。雖然心中還仍難過，但在回憶中卻也帶著一點溫馨，畢竟身為非思想史專業、非張老師嫡傳弟子，卻能成為張老師的學生，經歷過一段難忘的學習過程，也在學術上受到張老師的薰陶，這也是我人生的幸事吧！

謹以此文聊表對張老師的懷念，以及筆墨難以完整表達的感謝之情。